

烽火尺素里的家国壮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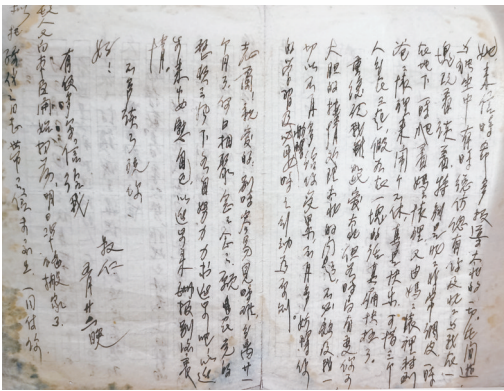
□ 洪 鸿

老辈人常说，家书抵万金。那不是书本上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在过去通信不发达的年代，家书是亲人别离后彼此联系亲情的纽带、倾诉思念的载体，特别是在战争岁月，保家卫国将士的家书里呈现的是烽火硝烟里熬出来的滋味。一纸薄薄书信，跨过千山万水，装得下骨肉牵挂，也盛得下山河大义。80多年前，在烽火连天的太行山上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，就在油灯之下，借着行军打仗的间隙，写下一封封家书。这些从炮火里留存下来的文字，没有华丽辞藻，就像庄稼人唠家常，一边念着老家的亲人，一边惦记着破碎的家国，把将军的一腔热血与万般柔情，清清楚楚地摆在了后人眼前。

左权是湖南醴陵人，少年时便辞别故土出外闯荡，投身革命，一走就是20年。枪林弹雨，南北转战，脚下的路越走越远，故乡的影子却总在心底搁着。仗打得紧，一年又一年，始终抽不开身回一趟老家，老母亲、叔父、兄嫂都留在千里之外的故土。人在前线运筹战事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心底的乡愁照样往上涌。从1937年奔赴华北抗日前线，到1942年壮烈牺牲，短短数年，他在戎马倥偬之间，前后写下十几封家书。一个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硬汉，把儿女情长、骨肉惦念，都托付给一纸尺素。

1937年9月18日的夜晚，山西稷山县北阳城村，夜色沉沉，战鼓未歇。左权刚刚收到叔父来信，得知自家兄长不幸离世，家中少了顶梁柱。国难当头，日寇铁蹄踏碎山河，家中又逢丧亲之痛，家国两重悲愁一齐压上心头。行军路上难得片刻安歇，左权就借着这一点空隙，提笔给叔父左铭三写信。字里行间满是悲痛，心疼老家亲人孤苦无依，可他心里清楚，自己不能抽身还乡。他在信里坦然写下，“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，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、伟大的”。

不是不念家，是千万百姓的家都已经处在危亡之中。信里，他一边牵挂年高的老母亲，盼望战争平息之后，一家人能够围坐一堂，过几天安稳日子；一边冷静剖析时局，讲明抗日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。他告诉家里人，八路军已经奔赴抗日前线，



左权写给妻子的第十一封信

要靠着游击运动战和日寇周旋到底，要准备吃大苦、耐大劳，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，就守不住民族的希望。一纸家书，一头牵着湖南老家的骨肉亲情，一头连着华北大地的抗日烽火。

时隔两月，身在洪洞县的左权，又提笔给远在醴陵的老母亲写信。读来字字揪心，他把日寇烧杀掠夺、荼毒百姓的惨状一一讲给母亲听，痛叹亡国奴的苦楚。他不回避现实的困境，直面抗战当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，也道出共产党人救国救民的执着信念。他盼望三湘大地的老百姓能够早早觉醒，拿起武器站出来。“湖南的民众，素来是很顽强的，在革命的事业上，是有光荣历史的。”寥寥数语，满是对故土乡亲的期许。他向母亲表明心志，八路军将士甘愿和华北百姓同生死、共患难，过去吃过草，往后还准备吃草，不为钱财、不为私利，只为民族能够得救。

这封书信，当年一直由左权的母亲细心保管。战火连年，音讯隔绝，老人日日盼着儿子归来，却不知道儿子早已血染太行。直到1949年解放军南下湖南，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嘱托，部队绕道醴陵看望老人，老母亲这才知晓，自己朝思暮想的儿子，已经为国捐躯7年。悲痛过后，老人托人写下祭文：“吾儿抗日成仁，死得其所，不愧有志男儿。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，牺牲一身，有何足惜，吾儿有知，地下亦瞑目矣！”半年之后，老人也撒手人寰。

沙场之上出生入死的男子汉，心里也装着儿女情长。34岁，左权才在

抗战前线遇见刘志兰，经朱德总司令牵线结成夫妻。1940年，女儿左太北呱呱坠地。炮火间隙里的团圆，短得像一场梦。太行山根据地日日遭受日军“扫荡”，行军转移危机四伏，带着幼儿随军太过凶险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左权只能送别妻女，让她们奔赴延安。谁也未曾料到，这一次挥手，便是生离死别。

此后21个月，关山阻隔，封锁重重，邮路断断续续。一封家书要托人辗转传递，常常要等三五月才能送到延安。他前后写给妻子12封信，现存11封，合计1.6万多字。打仗再苦再忙，油灯之下，他总要铺开信纸，唠一唠家常。

信里没有将军的架子，尽是普通人的心事。体谅妻子的思想苦闷，支持她读书求进步，宁愿自己忍受战地的孤单，也不愿耽误爱人的成长。打仗间隙，还记挂着小女儿的冷暖，托人四处搜罗布料，缝制夏衣冬裤，捎去饼干，连毛线裤这样细碎物件都记挂在心。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，心里装着家国大局，也放不下妻女的一粥一饭、一寒一暖。

1942年5月22日晚，战事已经迫在眉睫，硝烟就在眼前。左权匆匆写下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。忙里偷闲说起根据地的生活，自己在驻地种了洋姜、西红柿。独坐山野之时，脑海里一遍遍描摹一家人团聚的模样：女儿太北调皮，一会趴在地上，一会扑进妈妈怀里，又翻身钻到父亲怀中，嬉闹不休。字字都是人间烟火的念想。可他心里早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，落

笔郑重叮嘱，“我虽如此爱太北，但如时局有变，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，不必顾及我”。

字字读来令人心碎。满心疼爱自己的女儿，危难来临之时，却愿意放下为人父的私心，一切以革命大局为重。仅仅3天之后，日军发动疯狂大“扫荡”，八路军总部被敌人重重包围。危急关头，左权主动留下来断后，掩护机关干部、普通群众突围。炮弹呼啸轰鸣，他本可以寻机避险，却不肯丢下身边的战友与群众，最终血染十字岭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7岁。

这封写于生死前夕的家书，辗转抵达延安的时候，噩耗已经先行传来。一纸家书，成了永诀。

多年以后，长大成人的左太北一遍遍翻看父亲留下的书信，才真正读懂这位课本上铁骨铮铮的将军，读懂字缝里藏着的滚烫父爱。她把珍贵家书捐赠给国家，并写下给父亲的一封信，遥寄内心深处的深切思念，感慨父亲在敌后艰苦环境下拼尽全力尽着为人父的责任，那些跨越风雨的家书，是自己一生最珍贵的宝物。

硝烟远去，山河换了人间。今天我们再读这些烽火家书，看到的不只是一位将军的悲欢家事。战场上，他是运筹帷幄、视死如归的革命将领；家书里，他是惦念母亲的儿子，是体贴温存的丈夫，是舐犊情深的父亲。忠孝难以两全，家国不能兼顾，他把个人的幸福全部舍弃，把生命交付给民族解放的事业。

为纪念左权将军，辽县改名左权县。朱德总司令挥笔写下悼诗：“名将以身殉国家，愿拼热血卫吾华。太行浩气传千古，留得清漳吐血花。”清漳河水静静流淌，太行青山巍巍屹立。一页页泛黄的家书，穿过岁月风尘，依旧在向后人诉说什么是初心，什么是担当。一代代后继，正是从这样滚烫的文字当中，读懂家国二字的千钧重量。

红色记忆



乡村大集的烟火气

□ 王 艳



齐划一，把民俗变成程式表演，将原本自在流淌的烟火气刻意编排，失了本真。如何把一时的红火转化为长久的吸引力，让匆匆相逢变为长相往来，是乡村大集必须答好的一道现实考题。

深耕细作，精耕善治方可行稳致远。顺势而起，抢抓机遇，更要乘势而上，尤需实干笃行。守护好大集的烟火生机，关键在于走出一条特色化、精细化、融合化的路子。首先以特色立牌。立足一方水土，深挖黄河、运河、海洋等地域禀赋，盘活本土物产、非遗技艺与民俗资源，培育辨识度高的市集品牌，跳出千集一面的同质化困局，让每一次赶集都有新意、有回味。其次以服务留客。聚焦访客体验的痛点，补齐基础设施短板，规范经营秩序，优化人居环境，完善服务保障，以精细化的治理留住八方来客。再次以融合拓局。跳出单一商贸思维，以集市为支点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，串联乡村观光、农耕研学、文创开发等多元业态，延伸产业链条，让小小集市真正成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。尤为关键的是，要发挥好全社会的力量，政府重在规划与兜底，市场做好创意与运营，而村民始终是大集的主人。让返乡青年有舞台、让乡土能人有奔头、让普通农户得实惠，烟火气才有不竭的源头活水。

烟火氤氲不息，振兴步履不停。市井烟火藏着民生的温度，熙攘人流中聚着振兴的动能。乡村大集的蝶变，是乡土价值的回归，更是乡村活力的绽放。守住乡土本色，深耕发展优势，让市集热度久延续、乡村烟火生生不息，便能以方寸集场的蓬勃生机，撬动乡村产业兴旺、文化兴盛、治理有效。人们奔赴大集，所奔赴的远不止几筐时鲜、几样风物，更是一种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融合共进。这，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乡村篇章中，温润而绵长的乡土力量。

范蠡的重商之道

□ 张学博

范蠡，字少伯，楚国宛地人，是春秋时期越国名臣。他以20余年辅越灭吴，又在功成之后主动退隐，转而从事生产经营，数次积累巨额财富，又数次散财济人，政治上的进退、商业上的取舍与财富上的聚散，构成了范蠡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。范蠡的各种作为，体现了他对时势变化的敏锐判断和对进退取舍的清醒把握，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的重商实践丰富了中国古代早期的商业思想。后世评价范蠡“忠以为国，智以保身，商以致富，成名天下”，并尊其为“商圣”。

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灭吴，彰显了杰出的政治才能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记载，“范蠡事越王勾践，既苦身戮力，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，竟灭吴”。范蠡为越王复国效力，可谓殚精竭虑。而灭吴之后，范蠡主动离开越国。临走之时，他致书文种，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”。范蠡能在其功名最盛之时主动退身，体现出取舍有度的处事思路。

离开越国后，范蠡开启了第一次商业活动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载，“范蠡浮海出齐，变姓名，自谓鸱夷子皮，耕于海畔”。范蠡离越入齐后改名换姓，带领家人从事生产经营，很快便积累大量财富。齐人闻其贤能，请其为相。三年之后，他辞去相位，认为“久受尊名，不祥”，于是归

还相印，散尽家财，再次离去。

此后，范蠡迁居于陶，开启了他的第二次商业活动，实现了“三致千金”，达到了他商业上的巅峰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：“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。”陶地交通便利，诸侯往来、商品汇集，四方物产在此互通流转。这样的区位优势连接不同地区的物产与需求，有利于经营者比较各地价格、调配货物，扩大交易范围。范蠡充分利用陶地的条件和优势开展经营，成为名闻天下的陶朱公。这一次，他将钱财分给了贫穷的朋友和远房的兄弟，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”。范蠡能够数次积累财富，基于其对商业的非凡见解，《史记》于此有具体的记述。

范蠡注意观察供求变化，对货物价格有一定的认知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在范蠡事迹中记载了“计然之策”，其中提出了“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”的主张。计然是春秋时期一位著名的谋士，范蠡尊其为师，曾喟叹曰，“计然之策七，越用其五而得意。既已施于国，吾欲用之家”，表明他认同计然的观点，并在经商过程中采用了相关办法：当价格高涨至一定程度时，及时出售货物；当价格低落而货物具备未来需求时，则适时购入。这体现了范蠡具有依据供求关系

和价格周期进行反向配置的商业意识。同时，范蠡坚持“财币欲其行如流水”的主张，强调资金和货物的持续周转，认为只有保持货物与资金的循环，经营活动才能持续。范蠡的判断还涉及物产丰歉等因素对商业的影响。

范蠡重视农业生产与市场调节。他以农耕为本开展经营，离越赴齐后“耕于海畔”便是印证。范蠡的经济实践并非简单地对货物进行转手倒卖，而是以生产经营为基础，并将生产与货物流通结合起来。范蠡先“耕于海畔”，后选择在“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”的陶地经营，并且在生产和经营上都取得了成功。前者体现了他对生产基础的重视，后者体现了他对交通和商品集散条件的重视。由此可见，范蠡具有依托流通渠道实现物产价值的商业意识。

范蠡追求有节制的经营之道。“积善之理，务完物，无息币。以物相贸易，腐败而食之货勿留，无敢居贵。”“务完物”强调经营首先应当重视货物本身，保证其完整和质量；“腐败而食之货勿留”则要求根据货物的属性安排周转，尤其对于容易腐败的货物，不能长期囤积。经营者需要根据货物性质、市场需求和流通速度安排库存。“无敢居贵”说明价格上涨时也不宜长期惜售，因为这意味着将承担更

大的商业风险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将范蠡的经营概括为“与时逐而不责于人”。意思是说范蠡不把成败寄托于他人，而是根据时势变化主动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录了范蠡的获利方式和财富处置。“候时转物，逐什一之利”，说明其经营重视市场时机、货物周转和相对稳定的收益；“三致千金”，表明其经营并非依赖一次偶然获利；“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”，讲述其对财富的处置方式；“富好行其德”，则是对其对待财富态度的赞许性评价。

范蠡的一生充满传奇。在国家危亡之际，他能够挺身而出承担责任；霸业既成之后，又能够审势知止，转而成为成功的商人。在经商过程中，他能够聚财而不为财役，散财而不以为失，将财富视为济世利民之器，体现了顺应天道、崇尚自然的经济智慧，同时也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观点和实践范例。

